

余刃庖丁解 风斤郢匠成

——元代篆刻的书刻分工与自书自刻

李庶民

内容提要：实用印章向篆刻艺术的分流嬗变，元代是一个重要的历史节点。其中文人篆印、工匠刻制，文人自书自刻，印人自篆自刻是篆刻艺术独立前的多头实践过程。本文将元代篆刻中书刻分工与自书自刻的实例予以初步梳理，探幽析微，以助于元代篆刻研究。

关键词：元代篆刻 书刻分工 自书自刻

印章肇自三代，至今遗存以春秋、战国印为多。秦汉时期，制度为之一变，应用更为广泛，公私印制作蔚为大观，形式丰富多彩，材质有金、银、铜、玉、牙、石、木、角、瓷等，而以坚质的铜、玉为大端。

古代印章制作以政府机构为主。民间制作起自何时已不得详考，据考古资料，现存最早且可靠者当为汉代“元致子方书”信札。在1990年到1992年的甘肃悬泉置考古挖掘中，出土了23000余枚汉简等遗物，其中有帛书10件，均为私人书信。帛书“元致子方书”为成熟的隶体字，高23.2厘米，宽10.7厘米，墨书322字，其中便道及刻印一事：

吕子都愿刻印，不敢报，不知元不肖，使元请子方，愿子方幸为刻御史七分印一块，龟上，印曰“吕安之印”。唯子方留意，得以子方成事，不敢复属它人。^[1]

吕子都委托元转请子方刻一方“吕安之印”，大小约御史的十分之七，龟钮。元所居地悬泉置偏僻而人烟稀少，所需物品如信中提及的皮靴、响鞭、毛笔等皆须从外地有商埠市场处购得，而印章制作更非一般偏僻地方可得，故此信的受信人子方至少是在敦煌这样的重镇居住。而子方并非即是制印人，或许还要找专门制印处所或工匠完成。无论如何，此信札足以说明东汉时期私人印章的使用与民间刻制已经是大为普遍的了。

古人对手工技艺比较重视，非如后世鄙薄手艺人，而以一技之长官至高位者代或有之。如元代阿尼哥（1245—1306）因工画、善塑像，于至元十五年（1278）34岁便授光禄大夫（从一品）、大司徒，领将作院事（从二品）。何澄以工界画，授昭文馆大学士。昭文馆大学士元代不常置，而

[1] 胡平生、张德芳：《敦煌悬泉置汉简释粹》，上海古籍出版社2001年版，第187页。

宋代是以首相为之，可见是很高的荣誉。文人士大夫自己动手镌刻，在古代并非罕见。据记载，唐代颜真卿所书碑便有亲自动手刻制的。戴表元（1244—1310）《题茅生刻字后》云：

古之书家，无不能刻，其谓之书刀。后乃用以书丹入石，则愈劳矣。余尝行金、焦间，见米南宫题诗崖壁间，锋势飞动。遗老云皆其所自凿。今人名能书，以刻字为耻，殆非通论。^[1]

戴表元为有元一代诗文大家，其说当有据。至于印章自工匠到文人雅士自篆自刻始于何时，已难确考，据云米芾的自用印有多枚出自己手。丁敬《砚林印款》云：

米襄阳自刻姓名、真赏等六印，且致意于粗细大小间。盖名迹之存，古贤精神风范斯在，非欲与贱技者流仆仆争工拙也。刻附数语，质之鹤峰老先生真赏。^[2]

余昔藏米元章真迹六十字，后有朱文“米姓翰墨”印，盖公自刻者，今仿佛之。^[3]

丁敬所言，似应有出处。唯宋代绝少有文人士大夫自刻印之记载，故米芾之用印有哪些是出于自制，尚待确证。而元代则有诸多清晰明确的文字记录，或言文人篆而工匠刻，或言文人、印人自书自刻，其中如赵孟頫以元代书画领袖的身份亲撰《印史序》于印章首倡“古雅”，高扬汉魏典型，为篆刻艺术审美立一霞标，亦开文人印论风气。吾衍著《学古编》，于印学和篆刻技法深研细究，以自得治印法门，金针度人，布濩广大，亦为篆刻技法著述先进。王冕以“花药石”刻印，且以“汉制”为模式，开明代文人以叶蜡石类材料治印风气。以石为印材，历代容或有之，但影响深远形成规模，使石类材料成为文人刻印的首选，则王冕功不可灭。赵孟頫、吾衍、王冕三家以开山之功在印学史上地位显豁，故近人研究成果丰硕，自不待赘言。三家之外，元代还有诸多鲜为后人所知的印人、印事有待探讨。可以说，实用印章分流出文人篆刻、印人篆刻而逐渐走向独立，成为一门专门的艺术是在元代发生并完成的。篆刻艺术史，元代是一个重要的节点。元代文人士夫参与治印，可从赵孟頫《致王利用入城札》窥见一斑：

孟頫顿首国宾山长学士友爱足下：孟頫自顷得答字，云行当入城……承索先人《墓表》，谨以一本上纳，盖先子没四十余年，而墓石未建，念之痛心，故勉强为之，……非国宾相知，不敢及此。名印当刻去奉进。……闰月一日，孟頫再拜。……^[4]

此为赵孟頫复给王利用的信札。王利用，字国宾，号山木，通州潞县人。累迁监察御史，擢翰林待制，升直学士，历河东、陕西、燕南三道宪副，除四川按察使，大德年间（1297—1307）改安西、兴元两路总管，致仕居汉中。武宗海山即位，起为太子宾客。年七十七卒于官，谥文贞。《元

[1] 《全元文》第12册，江苏古籍出版社1999年版，第225页。

[2] 黄宾虹、邓实：《美术丛书》，江苏古籍出版社1997年版，第1324页。

[3] 黄宾虹、邓实：《美术丛书》，第1329页。

[4] 《赵孟頫文集》，上海书画出版社2010年版，第262—263页。

史》卷一百七十有传。

据单国强《赵孟頫信札系年初编》考证，《致国宾山长入城札》写于大德十年（1306）闰一月一日，此时赵孟頫在杭州，任江浙儒学提举。信札中“名印当刻去奉进”，应系赵孟頫篆印稿交刻工镌刻，非赵孟頫自书自刻。彼时文人用印以青铜、紫铜、黄铜为主要材质。如1990年杭州近郊胥家河鲜于枢墓出土的“鲜于伯几父”“伯几印章”两方白文印均为铜质。曾经为翁方纲收藏的“赵氏子昂”细朱文印为红铜质。

一、书刻分工

由文人士大夫或书家篆印稿，交由专门机构或工匠刻制，应是元印制作的主要方式。

天历二年（1329），元文宗孛儿只斤·图帖睦尔建奎章阁，置鉴书画博士。虞集奉敕篆“天历之宝”“奎章阁宝”，交内府工匠刻制。天历年间，元文宗召见杨瑀于奎章阁，命篆“洪禧”“明仁”二小玉印，玺文称旨，擢中瑞司典簿，署广成局副使。至正元年（1341），周伯琦为宣文阁授经郎，命篆“宣文阁宝”；闰五月，又诏刻“宣文”“至正”二印。此内府图书制作，或金或玉，例由中书礼部铸印局的工匠完成，文臣则负责篆稿。而一般私印制作，文人雅士自然会嘱书法名家篆稿，再交民间刻工去制作完成。据乾隆版《吴县志》记：“谢杞能刻印，元贞间（1295—1297）钱翼之有二私印为吾衍所篆，而杞刻之。”吾衍《竹素山房诗集》有“赠刊生林玉”：“我爱林生刻画劳，能于笔意见纤毫。牙签小字青铜印，顿使山房索价高。”可知吾衍于青铜材质印只是篆印稿，而刻制则为工匠。

姚燧《冯雪崖二孙名字序》云：

余以汉制瑞碑笔意深古，尝模麒麟字，促而小之，刻诸瑜玉，佩为私章。故人冯宪副雪崖，见而求之，曰：将赐吾孙以为名也，故长曰麒，次曰麟。^[1]

姚燧深爱汉碑额篆字，以之模为“麒麟”二字，缩小以玉石倩工匠制为印章佩带。朋友冯雪崖见之，求去并以“麒麟”二字为其两个孙子命名，以为祥瑞。古人佩印，一为使用方便，亦多有厌胜避邪之义，尤以玉印为尚。

姚燧（1238—1313），字瑞甫，号牧庵，河南洛阳人。三岁而孤，由伯父姚枢抚养成人。拜大儒许衡为师。至元七年（1270）奉召至京师，始任秦王府文学，寻升奉议大夫兼提举陕西、四川、中兴等路学校。历任陕西汉中道提刑按察司副使、翰林直学士、大司农丞等。元贞元年（1295）预修《世祖实录》。大德九年（1305）拜中奉大夫、江西行省参知政事。至大年间（1308—1311）授翰林学士承旨，知制诰兼修国史。年七十六卒。诗文、书法皆一时之选，著有《牧庵集》三十六卷。《元史》卷一七四有传。

元代科举长期停止，断续开科的时间只有48年16次，取士1200多人，还不及宋代一科取仕的人

[1] 《全元文》第9册，江苏古籍出版社1998年版，第383页。

数。所谓“自进士科废，家学无所乎用”（吴澄），这对广大文人儒士来说，无疑仕途阻遏，进身无路，遂多寄情山水，优游于书画，宣泄于诗文。而为生计所迫者，则为医卜、吏员、伎艺。能有幸进入官场又仕途顺利者则少之又少。故元代诗文、书画之盛，篆刻风气渐滋，不为无故也。王礼《赠唐克谦图书序》云：

自书契代结绳以还，人文日暄，而大朴日雕以散。周之玺节，六国之相印，又书契之变也。汉始有私印，以记姓名，视玺节、相印正刻者异，又节印之变也。自是士大夫图书制述，咸以志焉，意图书之名得昉此。隋唐而下，旧式渐乖。逮于赵宋，篆涉于巧，制失之夸，于是古篆不复见。而《淮南子》所谓方寸之印者，殆虚语也。元初，中朝诸老，丕变文风，凡图书古篆隶一复于古，印广以寸为度，痛革宋季钟鼎之谬制，而尚友千载，庶几皤皤乎淳庞之习矣。予尝玩印刻而思，可以得河洛纵横之意焉；可以见井田开方之法焉；可以写防奸杜伪之智焉。是则印刻之古也，而所益者广，而放乎古，非人心世道之还淳哉！^[1]

元代处于实用印章向篆刻艺术的分化转型阶段，一些术语与概念在初创时期，对篆刻艺术与实用印章及印人社会身份的认同还处于朦胧模糊状态，如称印章为图书，为图记，为印信，为篆刻，而又将刻碑称篆刻、图书。王礼便是将唐克谦所刻印章称为“图书”。且谓“汉始有私印”亦是错误的，盖时代局限使然。但是他能认识到印章的丰富内涵与社会价值、文化意义，则是其高明之处。而尚古，则是元代于书、画、篆刻共同的审美趋好。其指“宋季钟鼎之谬制”，与赵孟頫《印史序》所批评的“余尝观近世士大夫图书印章，壹是以新奇相矜，鼎彝壶爵之制，迁就对偶之文，水月木石花鸟之象，盖不遗余巧也。其异于流俗以求合乎古者，百无二三焉”^[2]，可见同一旨趣。

王礼（1314—1386），字子尚，后易字子让，自号清和道人，庐陵宣溪（今江西吉安）人。生而聪慧，八岁通读《四书》经传，十岁外出求师习举子业。十五岁作文挥笔立就。至正十年（1350）以《诗经》中江西乡试第一。十一年授安远县教官。十六年因功授兴国县主簿，不久以亲老辞归。之后应召江西参政幕府，十七年（1357）迁广东道宣尉使司都元帅府照磨。陈友谅陷赣州，王礼知元败亡之势无可挽回，便携家回庐陵，乡里已为丘墟，便构堂于古城旧址，教授乡里。以其所居有隐麟山，学者称他为麟原先生。入明，不赴征召。所著诗文多散佚，今存《麟原集》二十四卷。

文人、书家篆印稿，工匠镌刻完成的书刻分工，前面有钱翼之即钱良佑（1278—1344）将吾衍所篆二私印交谢杞去刻，林玉则经常因为吾衍所篆印镌刻精微无失而深得吾衍称誉。我们还于夏溥《学古编序》中确认吾衍名下的印章皆为其篆印稿而由刻工去最后完成。吾衍为人处世有洁癖，往往拒客于门外楼下，而与夏溥有深交，夏溥屡访吾衍而多获赠文物：“……余候先生好情思，多求诸人写私印，见先生即提笔书甚快，写即自喜。余‘夏溥’小印，先生写，可证也。”^[3]

当然，元代工篆书者甚多，书家为人写印稿非都如吾衍那样难求，如吴福孙，“其书篆施

[1] 《全元文》第60册，凤凰出版社2004年版，第591页。

[2] 《赵孟頫文集》，第114页。

[3] 黄惇：《中国印论类编》，荣宝斋出版社2010年版，第201—202页。

于金石为尤宜，奉贖币求之者无虚日。”^[1]看来写印稿与碑额等的收入亦不菲。吴福孙（1280—1348），字子善，杭州人。元贞元年（1295）补嘉兴路学录，迁宁国路学正。至元元年（1335）除常州路教授，改溲浦税课大使。至正六年（1346）升上海县主簿。年六十九卒。

二、自书自刻

实用印章向篆刻艺术的分化转型之所以发生在元代，与当时的社会背景有关。文人儒士失意于官场，无望于仕途，遂不得不寄情托志于诗文书画，而与诗文书画关系密切的印章，亦因之有更多的人浸染其中。元代篆隶书的兴盛、印材的多样化乃至石质印材的广泛使用，又推动着文人雅士与印人在书印、刻技交流中的自书自刻风气。一些印人演习书法，悟性高而功夫到者，得到文人士大夫的推誉时或有之，其中最为著称的即朱珪。朱珪（约1316—约1378），字伯盛，昆山人。工大小篆，尤善摹刻。深知艺人须文人士大夫抬举方能出人头地，故请一时名家为之志，为之铭，为之颂，为之诗，为之跋。杨维桢《方寸铁志》云：

吴门朱珪氏，师濮阳吴睿大小二篆，习既久，尽悟石鼓、峰碑之法。因喜为人刻印，遇茅山张外史，外史锡之名方寸铁，持以过钱唐，访余于吴山次舍，求一言白其所谓方寸铁者。余笑曰：“余方以铁石心取乖于世，而子又欲乖吾之吾乎？”虽然，古之豪杰修己治人者，必自方寸铁始。黄金、白玉可磨，此铁不可磨也。子以是铁印诸金、玉、铜、犀、象，使佩之者皆无愧于是铁，外史氏心印之教行矣。吁！岂直求工于刻画，无戾夫古制也哉。……至正十九年秋七月十日李黼榜同甲进士、今奉训大夫、江西等处儒学提举，会稽杨维桢志并书。^[2]

所谓以“方寸铁”题朱珪之篆刻，盖以喻其治印习篆心志如铁之坚也。元末，杨维桢以其诗文、书法与节操享誉大江南北，在艺坛有一言九鼎的影响，其为朱珪撰文褒扬，影响之大可以知见。杨维桢（1297—1370），晚年多署杨维桢，字廉夫，号铁崖，晚号东维子，山阴人。泰定四年（1327）进士，授天台县尹，改绍兴钱清场司令，坐损盐不调。至正初除杭州四务提举，转建德路推官，升江西儒学提举，避兵未上，遂浪迹浙西山水间。明初召诸儒考订礼乐，洪武三年（1370）正月至京师，以疾请归，卒年七十四。著有《东维子文集》《铁崖古乐府》等多种。各种资料均注杨维桢生年为公元1296年，卒年七十五。实则杨维桢生于元贞二年丙申十二月二十五日，若换算成公历则已是公元1297年1月19日，享年应为七十四。

陆仁《方寸铁铭》云：

娄东朱珪字伯盛，工古篆籀文，其于六书之义考之尤详。尝以余力刻印章，则为吴中绝艺。间游钱塘，遇句曲张外史，名之曰“方寸铁”，以喻其能坚其志操，期以进乎道，亦若桑国侨志于铁砚之“铁”云。虽然，科斗书废已久，必以篆籀为师法，汉隶而下不具论，能复其

[1] 《黄滔全集·上海县主簿吴君墓志铭》，天津古籍出版社2008年版，第561页。

[2] （明）朱存理：《珊瑚木难》卷三，上海古籍出版社1991年版，第815-70页。

古，其庶几朱君乎？朱君与予相从游，嘉其志操之坚白。今年予来玉山中，验朱君之书法益有进，是犹张旭悟公孙大娘舞剑器也。见其刻玉石如切泥，则又若漆园氏夸庖丁解牛而得肯綮也。张得于舞剑，庖丁得于解牛，吾知朱君得于书而悟外史方寸铁之旨矣，遂述其事而为之铭，铭曰：

圣人作，人文开。……心太古，姿朱珪。至正庚子夏四月廿有六日河南陆仁造。^[1]

由陆仁所言知，朱珪不但习篆书，还深究古文字，其技艺纯熟，刻玉石如切泥，有庖丁解牛技进于道之高妙。陆仁，字良贵，号樵雪生，以所居名“乾乾斋”，又自号乾乾居士，寓昆山。曾为水军都万户幕僚，工诗文，当时馆阁诸公皆重之，称为“陆河南”，有《乾乾居士集》。主要活动在至正年间。此铭撰于至正庚子，即至正二十年（1360）。秦约《方寸铁颂》作于至正庚子八月十八日，元鼎《方寸铁诗》作于至正庚子六月，与陆仁撰铭皆在同一年。秦约（1316—？），字文仲，太仓人。秦玉子。博学强记，好吟咏，至正年间为崇德州学教授。明初以文学举，召试《慎独箴》，以第一授礼部侍郎，以母老辞，改授溧阳教谕，在任八年，以老请归。《明史》卷一三六有传。顾瑛辑《草堂雅集》卷十三“秦约”云：“字文仲，淮海盐城人。居娄江，孝友先生秦君德卿（秦玉字）之子也。家传《诗经》之学，文行兼备，为乡闾所称。”^[2]《草堂雅集》收秦约《杂兴八首》《田家杂兴九首》，另有五、七言20余首。其《方寸铁诗》特称誉朱珪“猗方寸铁，媲昆吾刀，游刃发劘，妙契纵操。六书奥旨，探贖捐劳。……为印为章，珪璧丽宵。文苑艺林，世赖崇褒……”^[3]元鼎，字虚中，生平不详。其《方寸铁诗》署“天台氏学者元鼎书于白莲桂子轩”。诗曰：“人心何危患多岐，方寸之铁贵自持。百炼耿耿明秋晖，彼柔绕指惟诡随。朱盛刚劲真吴儿，法书铁画逼秦斯。晴窗握管俨若思，学成变法出瑰奇。铁可代笔犹神锥，用之切玉如切泥……”^[4]元鼎、秦约诸人所题，都注意到朱珪篆刻在刀下表现出来的书法韵味，注意到了印从书出的篆与刻的微妙关系，而“印从书出”此后一直为文人篆刻所重视，若只见刀法纵横，只恐入野狐禅之路径了。所谓“印章惟汉、晋佳绝，时去古未远，皆用白文，笔意精彩。至唐用朱文，笔法少废。末后渐为奇巧相尚，哀哉”^[5]。笔法、笔意的审美观念，深入文人思想深处。

顾瑛《方寸铁诗并题》云：

神斧磨天割紫云，仙苑殒玉发奇芬。灵书宝诀开刚卯，不数人间小篆文。
书刻输石总色丝，前身想是伏灵芝。虎头食肉元无相，铸钮休传左顾螭。
我家金粟道人章，瓦款蟠螭识未央。千古典型今复见，佩之何必兽头囊。
镂玉涂金与错银，尽将工巧失天真。君能独扫雕虫技，定品他年合出神。
伯盛朱隐君，予西郊草堂之高邻也。性孤洁，不佞于世。工刻画及通字说，故与交者皆文

[1]（明）朱存理：《珊瑚木难》卷三，第815—70—815—71页。

[2]（元）顾瑛辑：《草堂雅集》，中华书局2008年版，第1002页。

[3]（明）朱存理：《珊瑚木难》卷三，第815—71页。

[4]（明）朱存理：《珊瑚木难》卷三，第815—71页。

[5]（明）李日华：《味水轩日记》，上海远东出版社1996年版，第378页。

人韵士。予偶得未央故瓦头于古泥中，伯盛为刻“金粟道人”私印，因惊其篆刻篆文与制作甚似汉印。又以赵松雪白描《桃花马图》求刻于石，精妙绝世大合松雪笔法。惜其不得从游松雪门，使茅绍之专美于今世。因题卷末以美之。伯盛勿以予言为誉，后必有鉴事者公论也。至正十七年中秋日书于玉山草堂顾何瑛。^[1]

顾阿瑛即顾瑛（1310—1369），又名顾德辉，字仲瑛，别号金粟道人，昆山人。昆山在元代属江浙行省平江路。顾瑛出身豪富之家，但轻财好义，不屑仕进。年三十摈弃旧业，折节读书，礼贤下士，广接名流，并购置古书名画及古器物，以品题鉴赏自得。至正年间曾举茂才，署会稽教谕，又辟行省属官，皆不赴职。年逾四十，将田业交付子婿辈，在旧宅之西筑园林，名玉山佳处，习称玉山草堂。从至正八年（1348）到十年，先后落成26个景点。广招文人墨客，择时、择地饮酒赋诗，时称玉山雅集（草堂雅集），顾瑛因之成为江南文坛影响广泛、知名度颇高的文坛东道主。入明，因其子顾元臣曾为元水军宁海所正千户、水军都府副都万户，全家迁徙至临濠安置，洪武二年（1369）去世于临濠编管地。工于诗文书法，有《玉山璞稿》二十卷，编辑有《玉山名胜集》《玉山名胜外集》《玉山倡和》《草堂雅集》等。通过顾瑛的诗题，可知其曾请朱珪以汉瓦刻“金粟道人”印，此为印人以秦砖汉瓦为印材篆刻的较早记录。

郝经《方寸铁诗》云：

朱珪手持方寸铁，抚印能工汉篆文。并剪分江龙喷月，昆刀切玉凤窥云。他年金马须承诏，此日雕虫试策勋。老我八分方漫写，诗成亦足张吾军。至正辛丑八月朔陇右郝经书平湖草堂。^[2]

郝经（1300后—约1378），字仲谊、仲义，号观梦道人，陇右人，寓海陵。元末乡贡进士，官平江路儒学录。入明居杭州，洪武四年（1371）为浙江考试官。十一年（1378）至京师依子郝昉就养。此诗写于至正二十一年辛丑（1361）。陶宗仪《南村辍耕录》录唐伯刚题郝经小像诗：“七尺躯威仪济济，三寸舌是非风起。一双眼看人做官，两只脚沿门报喜。”^[3]徐一夔《送朱仲谊就养序》云：“吾友朱仲谊，旷达人也。自其少时学明经，举进士，尝有志于世用矣。然仅小试，出做学官末座，而天下有事纷争，一时未遇之士，悉变其所学，不鬻孙吴之书，则掉仪秦之舌，以干时取宠。仲谊薄此不为也。独务博览强记，以涵蓄其胸中。……乃以尝所涵蓄者，发为歌诗。缘情指事，引物连类。……云行水流，金鸣石应，有风人之体裁。……”^[4]朱仲谊即郝经，又作朱经。依上所形容，可知其人其言其行之大概。

[1]（明）朱存理：《珊瑚木难》卷三，第815—71—815—72页。黄惇《中国印论类编》录此诗文，“书刻”作“画刻”，“左顾螭”作“左顾龟”，“出神”作“入神”，“求刻”作“钩勒”，“从游”作“从游于”，“顾阿瑛”作“金粟道人顾阿瑛书”。

[2]（明）朱存理：《珊瑚木难》卷三，第815—72页。黄惇《中国印论类编》“陇右郝经书平湖草堂”作“平湖草堂中写陇右郝经”。

[3]（明）陶宗仪：《南村辍耕录》，中华书局1959年版，第354页。

[4]《始丰稿校注》，浙江古籍出版社2008年版，第198页。

陈世昌《题方寸铁诗》云：

朱生心似铁，篆刻艺弥精。应手多盘折，纤毫不重轻。么么形独辨，螺扁势初呈。汉印规模得，秦碑出入明。风流金石在，润色简书并。余刃庖丁解，风斤郢匠成。达观应自我，赏识足平生。趁刻无多讶，因君托姓名。钱唐陈世昌。^[1]

陈世昌对“方寸铁”的喻指，显然要高于郑经，诗也贴切透彻，形象鲜明。“余刃庖丁解，风斤郢匠成。”用典信手拈来，切中肯綮。“因君托姓名”与首联“篆刻艺弥精”回环照应，首尾呼应，脉络流畅清晰，的是好诗。陈世昌，字彦博，钱塘人。至正初由布衣入为翰林编修，代祀海上，值道梗，遂留嘉兴，授徒养母。张士诚据吴，屡召不就。明初征修礼书，授太常博士。生卒年不详。此外，郑元祐（1292—1364）《赠朱伯盛诗》、李孝光（1297—1350）《赠朱伯盛诗》、张雨（1283—1350）《赠朱伯盛诗》、倪瓒（1301—1374）《赠朱伯盛诗》、郭翼（1305—1364）《赠朱伯盛诗》等，虽然皆名家之作，但大体不出以上范围，盖尊题之格，已成定式，或有褒扬之过亦难免俗，故不尽录。朱珪本为刻碑工匠，从吴睿学书法而得以进入书家行列；又将宋人王伯顺及元人吾衍、赵孟頫编辑的印谱重新编纂摹刻，引起尚古风气深厚的元代学人关注；又以刻印技巧的纯熟被誉为“吴中绝艺”；又主动结交文人雅士并广求诗文赞赏，终于在众多的自书自刻印人中脱颖而出，蜚声艺坛。朱珪号为征君隐居，实则不甘寂寞。郑东《赠朱伯盛诗序》言之确确：

士不用于当世，必有托焉。而隐者虽一艺之微、一事之卑，皆不耻为之，故往往有托于农圃、巫医、商贾、群工之中，盖惟求其可以自晦而已，又庸计其高卑可否而后处其地哉？吴郡朱珪，居娄江之旁，无他嗜好，独喜周籀、秦斯篆画之古，取石鼓、峯碑之文，习之既久，而尽悟其法。因善为人刻印，贤士大夫多就珪求刻焉。珪之言曰：“吾闻位高者身危，禄富者忧大，名盛者毁随，彼有自始仕而仕，长发落齿脱而不知止，及其遭疑忌而废斥，触刑辟而戮辱，于是时也，则虽深咎极悔，已无及之矣。今吾耑吾意于篆画，唯求其无部分之失、旁从之讹，而无戾夫古人制作之义，吾过亦寡矣。”若珪，盖有托焉而隐者欤！永嘉李孝光、吴郡张雨作诗以贻之，珪不绝于当世贤者，则其为人又可知已，故予系之以序。至正十四年四月昆阳郑东书。^[2]

至正十四年为公元1354年，以此可推知李孝光、张雨等人题诗的时间。郑东，字季明，号杲斋，温州平阳人，晚居常熟。幼酷嗜书。应举试不利，即弃去。专力于古文词，明《春秋》。后生学徒为举子业者，一经指授，皆就绳墨。作文为诗，旨趣高远。宋濂称：“杲斋之文，气质沈雅，如老将帅师，旌旗金鼓，缤纷交错，咸归节度。曲全之文，规制峻整，如齐鲁大儒，衣冠伟然，出

[1] （明）朱存理：《珊瑚木难》卷三，第815—72页。

[2] 黄惇：《中国印论类编》，第205页。

言不烦，曲尽情意。然皆有台阁弘丽之观，而无山林枯槁之气。”^[1]

元代自书自刻的印人，多见于元人文集中，以下略举数例。

吴澄《赠篆刻谢仁父序》云：

古之天下书同文，书之用大矣。而古武者云“书止记姓名”，不其小欤？然自篆废隶兴，晋唐以来楷书相尚，而古书法泯如也。近代图书之表识、笺牒之緘题，古书法乃犹以记姓名而存一二。谢复阳仁父，儒家子，工篆刻，余每视其累累之章而喜，岂真为其笔法、刀法之工哉？盖庶几其存古，而将与好古考文之君子征焉。^[2]

谢仁父作为儒家子，没有猎取功名入仕途，在元代科举取士聊胜于无的背景下，实属常态习见。而其能于书法、篆刻上下功夫又成绩可喜，则不仅止于一艺之能而已，故好古考文之士亦乐与之周旋。文人儒士介入篆刻，对篆刻艺术走向独立的推动作用显而易见。吴澄（1249—1333），字幼清，晚号伯清，学者称草庐先生，抚州崇仁（今属江西）人。至大元年（1308）召为国子监丞。至治三年（1323）超迁翰林学士，进阶太中大夫。泰定二年（1325）主修《英宗实录》，并以此诏加资善大夫。作为元代大儒，吴澄与许衡齐名。卒谥文正。《元史》卷一七一有传。工诗文书法，著有《吴文正公集》《草庐精语》等十余种百余卷。

程钜夫《赠彭斯立序》云：

庐陵彭斯立工篆刻，一日携所刻若干印章谒远斋，曰：“是可以不朽。”余曰：“是可以不朽乎？”曰：“未也。吾刻古帖，可上拟阁本淳化，若绛若潭，若临江、武陵，直下视之耳。吾又将取今名卿巨公雄文大章尽刻之。配古以传，愿得公手书为文四五十篇归刻之。”予曰：“子之技善矣哉，子之志异矣哉。……文之传不传，系其文之善否；书之传不传，系其书善否，非帖比也。……予于斯文刻不刻，不敢计也，传不传不敢知也。独善斯立技之善而志之异……”^[3]

彭斯立以所刻印拜谒程钜夫颇自信，更以其摹书法，刻法帖、书籍而自视甚高，于《淳化》《绛帖》《潭帖》等闲视之，然于篆刻则未敢轻易放言，足见篆刻虽小技亦未易遽成，由技进道，非一日之功，况欲不朽乎！程钜夫（1249—1318），原名樵，28岁时改名文海，字钜夫，号雪楼，又号远斋。避元武宗海山名讳，遂以字行。先世为徽州人，后迁建昌（今江西南昌）。至元十三年（1276）随叔父飞卿入觐元世祖，授千户。十五年（1278）攀家人备宿卫，改直翰林，授翰林修撰，累迁直学士兼秘书少监，加翰林集贤直学士同领会同馆事。二十三年（1286）拜侍御史，奉诏求贤江南，荐赵孟頫等二十余人，拜集贤学士。二十六年（1289）力劾权臣桑哥，险遭不测。三十

[1] 顾嗣立：《元诗选》三集，中华书局1987年版，第489页。郑东字“杲斋”，中华书局1987年出版的《元人传记资料索引》误为“果斋”。

[2] 《全元文》第14册，江苏古籍出版社1999年版，第228页。

[3] 《全元文》第16册，江苏古籍出版社2000年版，第141页。

年（1293）出为闽海道、湖南湖北道、山南江北道、浙东海右道诸处肃政廉访使。曾主修《成宗实录》《武宗实录》。工诗文书法，著有《雪楼集》四十五卷。《元史》卷一七二有传。

元代科举之路闭塞，文人儒士大都出仕无门径，除家资田产丰饶者，甘贫苦授徒养生者，则不为吏员，便为医卜、杂技等以之谋生，其中以刻印制碑而又游于艺者，又当令人刮目相看。陆文圭《赠朱自明序》云：

秦玺篆玉、汉侯王印章，黄金者销毁，铜铁至今犹有存者。……丙寅夏，余来容山，朱晦自明见于明德堂上，鄙之浮梁人也。余扣之曰：“习举子场屋之文乎？”不答。曰：“为刀笔簿书之业乎？”又不答。徐曰：“吾祖敷文尚书，穆陵之师也，御书楼犹存焉。云汉昭回之章，则族多而数裂去之矣。岸谷转移，落拓不振，浪走江湖，性颇好古。工图书篆刻之学，游戏三昧而已。儒幼儿学之，吏亦尝试焉，皆能之而不为者也。”余闻其言而心怪之，会县庠立文宣王加封碑，君即解衣盘礴而周旋之，体制甚古，乃知韬光晦迹之士，藏于医卜技艺之间者，世多有之，道虽小而必有可观，未可谓壮夫之所不为也……^[1]

朱晦出自仕宦之家，而不喜举子业，厌弃为吏，习书法、好篆刻而能以游戏三昧视之，以入自在无碍之域，得正定忘筌之境。这种认识，无疑高出群伦，得艺术真谛者，绝非一般工匠乃至印人能臻至，审为其所自道者。陆文圭（1252—1336），字子方，江苏江阴人。宋咸淳初以《春秋》中乡选。宋亡，隐居城东。延祐元年（1314）再中乡试，赴京参加会试不中。延祐七年（1320）又中乡试，未赴会试。后朝廷遣使驰币数征聘，以老疾不果行。泰定三年（1326）应容山县聘，授生徒于学。著有《墙东类稿》。《元史》卷一九〇有传。

李祁《题张天举图书卷》云：

禾川张天举，书生也。攻篆刻印章，位置风格率不失古意，一时士大夫多爱用之。间尝为予作二印，予语之曰：“予老矣，无复用意斯文，恐负子印。方今泰运渐回，将见氛翳，开豁壁奎，明耀文章，翰墨宜有盛于昔时，则子之精艺，其见爱用于当时之士大夫者，亦将不啻今日矣！子姑待之。”^[2]

尚古意，是元人对书、画、印、诗、文诸艺审美观照的总体企向与崇尚，于印章亦然。赵孟頫《印史序》便推举“古雅”而贬斥“新奇”，足见一时风气。“一时士大夫多爱用之”亦可见彼时文人用印已成时尚。张天举以一介书生攻篆刻，亦可见文人介入篆刻之趋向。李祁（1296—约1373），字一初，号希蓬，湖南茶陵人。元统元年（1333）左榜进士第二，授翰林应奉。以母老就养江南，改婺州同知，迁江浙儒学提举。丁忧，隐于永新山中。入明，力辞征辟。有《云阳集》十卷。

王礼《赠唐克谦图书序》云：

[1] 《全元文》第17册，江苏古籍出版社2000年版，第533—534页。

[2] 《云阳李先生文集》卷九，《北京图书馆古籍珍本丛刊》卷96，书目文献出版社影印出版，第281页。

……东昌唐克谦，攻文章之印，篆古而制雅，布置得宜，运削匀洁。庚庚然，如瓷之碎也。辉辉然，如玉之润也。使益精其说，将识者动目，如摩挲岐阳石鼓，如登峰山读秦刻，如鸿都门外睹蔡中郎三体书，讵非艺苑之快事哉？虽然，一事之精，恶足以尽克谦之美。其自牧卑损，慕尚清高，疏通达练，异日且大用于时而予独叙其印刻之善者，喜其有助于已也。予于文不工，于辞而尚乎古，又得印刻之精者以黼黻之，岂不足以增重于时人之耳目哉？欧阳公尝言：“吾文将赖君谟之书而传。”予于克谦图书之印亦云。后之览斯文者，有不一握为笑也乎？^[1]

唐克谦不但精于治印，尤能于入印的篆书笔墨韵味表现得古意盎然，或如《石鼓》之圆劲，或如《峰山》之婉通。非徒以刀凿炫技者，其实质是反映着印人的学养雅俗、文野、高下。以书入印的观念，是文人篆刻乃至后世篆刻家的主流意识。近代沙孟海则曰：“治印有三要，曰识字，曰辨体，曰本学，而刀法不与焉。明习六书，默识旧文，诊其变化，穷其原委，识字之事也。前代玺印，各有体制，取法乎上，不容牵辄，辨体之事也。造意遣词，必于大雅，深根宁极，造次中度，本学之事也。不求此三者，徒断断于刀法之微，是谓舍本而逐末。”^[2]

黄镇成《赠李子奇序》云：

同郡李子奇，有材艺，而自隐于世者也。……好学博古，于钟鼎篆籀分隶之书，律吕还宫正变之法，有能知者，莫不辨问究析以求其端。……先汉公私印章，多所考综，凡图书款识，或范铜镌石为之，得良朋即与无靳也。若非其人，虽贵势厚资不屑也。所居庖垣败屋，风雨不庇，而华裾连骑之士常乐与日造其门。储无甌石，而奉亲菽水之具，常尽其欢心……^[3]

李子奇笃志于学，于书法深究篆、隶，通音韵之学，能范铜刻石驾驭多种材质，可谓典型的职业篆刻家。为人高洁，处世不卑不亢，得良朋益友，慨然以印赠之而毫不吝惜。家贫乐道泰然处之，真达人通士、德成而上者。难怪有那么多文人雅士乐与之交往。黄镇成（约1283—1357），字元镇，号存斋，福建邵武人。延祐初曾参加科举，不合于有司，遂放弃荣利，云游天下。后筑室城南，名曰“南田耕舍”，专心圣贤之道。屡拒推荐。平生著述颇丰，今存《尚书通考》十卷、《秋声集》十卷。

蒋易《图书序赠李子奇》云：

图书，古印章式也。……若柯敬仲以小“柯九思”阳文，墨以识书画之神品者，盖衮衮蒙也。……著郡望，以图书印连文，及进呈诗词亦用图书，文曰：“臣孟頫”者，自赵子昂始也。……困学有“鲜于伯几父”，……昭武李子奇，敦朴耿介之士也，所作图书印章，得汉遗制，士大夫爱重之，乡先生存存斋序其行艺于行卷。子奇来建阳，复求予言，则为著古今图书

[1] 《全元文》第60册，第591—592页。

[2] 《沙孟海论文书集》，上海书画出版社1997年版，第354页。

[3] 《全元文》第36册，凤凰出版社2004年版，第497—498页。

源流更袭之由，以为篆、籀之一助。好古博雅之君子，尚有稽于此乎？^[1]

黄镇成之文，特将印章的文字内容作了分类，因内容较长，仅节录其中述及元代名家赵孟頫、柯九思、鲜于枢等人的用印部分，可窥元人用印类型之一斑。传世的鲜于枢四十多种书法作品中有其常用圆形朱文的“鲜于”、白文“鲜于伯几父”“伯几印章”等印，然皆有同形同内容粗看为同一印、细审皆有异，当是真伪杂处。而白文“鲜于伯几父”“伯几印章”二方铜质印章已于1990年在杭州市郊的鲜于枢墓出土，为真品无疑，可为鲜于枢传世作品鉴定提供可靠实物证据，此古人印章于后世又一功用也。蒋易，字师文，号桔山真逸，福建建阳人。早岁励志笃学，师从杜本。及长慕司马迁之为人，遍游长、淮以南，结交当世名士。工诗，善属文，富藏书，号称万书楼。洪武八年（1375）尚存。著有《鹤田文集》，曾编辑《皇元风雅》三十卷行世。

自书自刻的印人，工书法是必要条件，尤以篆、隶为主。元代篆隶书远胜宋代，见于墨迹、碑石而著姓名者，不下数百人。方回《赠刊印朱才俊》云：“……朱生赠我古印章，奎躔璧度森开张。自言少小嗜此艺，意欲径上阳冰堂。细观刀笔最佳处，颇识传笺通训故。苟焉糊口栖此身，元来亦是知书人。”^[2]是知朱才俊非只工于刀技，篆书亦欲力追李阳冰，于篆刻一艺，非止于衣食糊口而已，乃是一种艺术追求。方回（1227—1307），字万里，号虚谷，安徽歙县人。宋景定三年（1262）进士。降元后为建德路总管，不久罢官，往来杭、歙间。工诗善书，著有《桐江集》《瀛奎律髓》《桐江续集》《续古今考》等多种。

吴澄《赠柳士有序》云：

三峰柳先生以《尚书》义为进士，师门弟子擢第、预贡、登上庠者百余人。子士有世其业，以俊异称。自进士科废，家学无所乎用，遂易业习古篆，侵姓氏名号，遍历公卿大夫之门，余谓士有之业虽易，而不离文字间，是亦无忝于其先。然此事政未可以小伎目，视昔所业尤难焉。难有三：识字，一也；善书，二也；工于用刀，三也。刀之技既工矣，若识字，则前代许祭酒，近代郑国史，戴通守之书，与夫徐骑省、李县令之碑刻，古钟鼎之款识，俱不可不详究也。今之善书且识字者，在洪有熊天慵氏，有司马九皋氏，试往问焉。^[3]

柳士有为儒学世家，故其书法、篆刻皆不失儒者风度，且又颇究古文字，见高识广，诚为实至名归之篆刻家。吴澄又有《赠郑子才序》：

……自隶书盛行，笔史惟简便是务，类知有今，无复知有古矣。刀笔工为人刻姓名印章，独不可废仓颉、籀、斯三体之文，然亦依随旧刻，往往袭舛踵讹，孰能正之哉！建康郑子才，业此技三世矣，士大夫多与之交，非徒取其刀刻之精也。所作之字，分合向背，摆布得宜；上下偏傍，审究无误。于用刀也，见其艺之工焉；于用笔也，见其识之通焉。艺工而识通，求之

[1] 《全元文》第48册，凤凰出版社2004年版，第60—61页。

[2] 黄惇：《中国印论类编》，第196页。

[3] 黄惇：《中国印论类编》，第197页。

治经为文之儒，或未至此。予之进之也，岂敢真以工师视之而已哉！^[1]

郑子才虽然生长于世代为工艺技师之家，然于篆刻能自觉以书法滋养，入文儒之境，故吴澄以为不可仅以“工师”视之。这亦是元代印人异于前代而开后世风气之可贵之处。在元代，工书法、精篆籀的印人已初具规模。胡炳文《赠图书胡松友》云：“我有养生四印，从渠□□双传。推出一窗明月，梅花枝上先天。”^[2]诗中所缺二字，当是“书刻”之类，乃称赞胡生所刻四印皆书、刻俱佳。谭景星《题李才甫图书卷》云：“雕戈之篆，铜盘之文，飞鸾舞凤，搜琼镂珉……”^[3]刘诩《赠曾维新工篆章》云：“风吹铁笔雪珊珊，篆法推寻古意还。老去姓名谁记忆，若为镌刻得人间。”^[4]柳贯《题有源图书卷后》云：“官章文学范精同，摹印书兼篆刻工。犹是古人传信息，雕虫元不在扬雄。”^[5]吾衍《赠刻图书钱拱之男钱璫二绝句》之二云：“一种青铜自琢磨，尔家铜色似宣和。十年为尔腾声价，不道平生篆已多。”^[6]元代篆刻之盛于此可见一斑，且胡炳文（1250—1333）、谭景星（生卒年不详）、刘诩（1268—1350）、柳贯（1270—1342）、吾衍（1268—1311）等皆一时诗文大家，书画、篆刻名流，他们与印人惺惺相惜，赞誉布濩，使篆刻艺术逐渐传播至社会各阶层，加之材质转向以摩氏硬度三度以下的石材为主，这便为明代文人篆刻艺术的确立开拓了路径，奠定了基石。

“余刃庖丁解，风斤郢匠成。”技道不二、技进于道的篆刻艺术之花，在元代新姿绽放，馨香幽远。

（作者系晋中市书法家协会主席）

[1] 《全元文》第14册，第212页。

[2] 《云峰集》卷八，《景印文渊阁四库全书》1199册，第809页。

[3] 黄惇：《中国印论类编》，第200—201页。

[4] 黄惇：《中国印论类编》，第200—201页。

[5] 黄惇：《中国印论类编》，第200—201页。

[6] 黄惇：《中国印论类编》，第200—201页。